

热点热议:异地高考

中央应一揽子解决异地高考问题

采访者:本报记者 张林 受访者:政协委员蔡克勤、葛剑雄、温思美

在去年年底各地推出的异地高考方案中,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方案并不如人意。关于异地高考所附带的教育公平问题,背后涉及高考、户籍等多项制度的改革,正变得日益复杂。同时,实施怎样的异地高考也渐渐演变为不同利益群体的激烈博弈,政策推进充满阻力。

未来,如何推进异地高考政策落地、实施,如何加快包括高考制度在内的教育制度改革,需要社会发展,需要改革时机,更需要政治决心。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原副校长、国务院参事蔡克勤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对异地高考而言,改革的时机已经到来,倘若错过,将来会变得更为复杂,付出的成本会更多。

解决异地高考在中央

异地高考不是新话题,但自去年政策破冰之后,无疑成为我国教育改革的一大进步。“现在都知道不改不行,但怎么改谁都没有底。”蔡克勤认为,只要户籍制度不废,高考、人才流动

等问题就不会有彻底的改变,“但出路还在于实践,需要不断试点”。

在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看来,异地高考最初是为了解决高考不便的问题,即获得公平的考试机会;后来又增加了录取问题,涉及名额分配和录取标准的合理性问题;现在已演变为希望通过异地高考问题的解决实现教育公平,“异地高考问题被不断复杂化”。

“现阶段应该主要解决回原籍参加高考不便的问题。要靠教育部和国务院,而不是地方政府。”葛剑雄对《中国科学报》记者强调:“异地高考牵涉教育资源的配置,怎么能让地方解决?”

从2009年至今,全国政协委员、华南农业大学副校长温思美在两会上共提交了3个关于异地高考的提案,但得到的答复都不令人满意。他认为,去年中央政府在招生计划(如招生计划、经费配置)及相关政策未作调整的情况下把异地高考的责任交给地方,地方在缺乏约束力的条件下,只能因地制宜、有限度地予以推进。

“从这个角度看,公众应该理解地方政府

的苦衷。”温思美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问题的根源在于教育部推出的政策缺乏约束力,也没有配套措施。“政策”出台仓促,有所保留且不一致。”

建议出台高考改革时间表

葛剑雄在今年两会期间提交的异地高考提案,建议以招生制度为突破口推动异地高考改革,教育部直属大学应面向全国开放、自由竞争、自主招生;地方大学由教育部或中央政府协调,拨出一定名额来解决异地高考的问题;国家须调节教育资源,主要协调教育资源大省与教育资源匮乏省份之间的名额问题。

“这是一个相对稳妥的方案,但其每一步达到的目标是有限的。”葛剑雄表示,不要希望通过一些举措能解决所有问题,更不要指望通过教育改革来解决中国长期存在的经济文化方面的差异。

温思美认为,解决异地高考,根源还在于中央政府。因为高考和义务教育不同,义务教育需

要地方财政提供主要支持,而高考问题主要是宏观资源的配置,更多的在于配置政策与制度资源,而涉及的财政成本相对有限。

“不要形成中央和地方互相推诿、博弈的局面。”温思美说,只要有足够的决心和政治意愿,加上很好的制度设计,这件事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同时,异地高考将为千千万万学生及家长带来巨大收益。无论从政治、社会管理还是经济角度看,这项政策的调整及相关政策配套是非常值得实践的。

温思美建议,中央完全可以出台全国统一的政策,通过宏观政策的调整与教育资源的重新配置,一揽子解决异地高考问题。

蔡克勤则建议,代表委员们应该督促教育部尽快考虑制定高考制度改革的时间表、路线图以及具体实施步骤,让公众明了。同时,如何更好地实现教育机会的公平、均衡,需要通过改革实践一步步松口,而不能一下全面放开。

“现在,高考制度改革的呼声很高,坚冰已被破冰,这是很大的进步,但出路还需要进一步探索。”他强调。

建言

南开大学校长龚克代表:

取消公费研究生符合改革要求

“取消研究生公费制度实际上是对研究生培养制度的改革,符合教育体制改革的要求。”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3月5日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

龚克介绍,让研究生仅凭身份就能获取国家公共财政的资助,这在全世界都是没有的事情,是计划经济分配体制的延续。

目前,我国研究生主要分为计划招生、自筹经费、委托培养等多种方式。其中,国家计划招生占主体,也被称为“公费生”。

然而,近年来,已有一些学校率先进行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取消公费生。

龚克认为,取消研究生公费制度,并不是要让研究生从家里要钱上学,而是通过研究生培养机制的改革,促进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升。要落实这个政策,必须进行相应的政策调整。

此外,对于目前高校的“三助”政策也应进行相应调整。三助,即助研、助教、助管。今后学校一方面要加大对助教、助管的资金投入,支持贫困学生,另一方面要争取更多的科研项目 and 科研经费,资助支持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并以此抵扣学费。“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导师和研究生没有好的科研项目做,但因为他的身份是导师,所以他必须招收研究生,研究生的身份是研究生,所以要公共财政给他出钱,这是没有道理的。”龚克说。(本报记者张巧玲)

建设三沙海洋地质公园迫在眉睫

“现在我国有218处国家地质公园,但尚没有位于海洋的国家地质公园。如果能在三沙建立海洋国家地质公园,不仅有利于科学开发利用海洋资源,保护三沙独特的海洋生态环境,而且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海洋国土意识,维护南海主权和海洋权益。”

在今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民建海南省委主委施耀忠带来这样一条建议。

我国三沙市的西南中沙群岛分布有岛屿、沙洲、暗礁、暗沙、暗滩等260多座岛礁,具有独特的珊瑚礁地貌,裸露海面的岛礁面积虽小,但水下礁盘面积达数十至数千平方公里。

在神奇的地质构造下,该地区形成了非常适宜珊瑚礁生长的环境,共有珊瑚84属300种,居世界前列。西南中沙群岛海洋生物资源丰富,仅西沙就有热带鱼类114种,贝类、海参类20多种。

施耀忠建议,有关部门要尽快开展实地调查和野外考察,完成三沙海洋国家地质公园的规划审批工作。“要从建设海洋强国、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高度出发,加大对三沙海洋国家地质公园建设的财政支持力度,中央财政要重点支持海岛与海洋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修复,地方财政支持建设国家地质公园规划、开展国家地质公园报批工作提供经费保障。”(本报记者丁佳)

(上接第1版)

《中国科学报》:面对创新驱动发展的历史性任务,中国工程院将如何进一步加强国家工程科技思想库建设?

周济:在新时期加强国家工程科技思想库建设,一是要继续做好战略咨询。面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发展的重大战略需求,围绕科学发展中的重大工程科技问题等,组织好咨询研究项目;加强战略研究队伍建设,动员和组织全体院士积极参加战略咨询。二是要深化科技服务。落实与地方、部门和企业签署的合作协议,完善科技合作服务平台,提高科技服务效益。面向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为企业由大到强提供服务。三是发挥学术引领作用。加强“中长期工程科技发展研究”,引领工程

科技学术方向,重点办好国际高端论坛、中国工程科技论坛等。四是推进工程科技人才培养工作。抓好“我国工程科技人才成长若干重大问题研究”及“工程科技人才培养研究专项”,促进高校与工程研究院所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试点工作,积极推动工程教育的改革与实践。

同时,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全力推进2014年国际工程科技大会的筹备工作;发挥外籍院士作用,加强与国外工程院和国际工程科技组织的交流合作,办好双边、多边学术交流。

《中国科学报》:加强院士队伍建设一直是中国工程院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今年又是一个院士增选年,我们将从哪些方面继续加强院士队伍建设?

周济:2013年,我们将落实中央关于完善院士制度的要求,集中力量做好院士增选工作,严格执行增选相关办法,严把入口关,保证增选工作质量,进一步严肃院士增选纪律,接受社会监督,确保增选工作的公平公正。

同时,加强院士科学道德建设工作。2012年,我们大力宣传院士的先进事迹,弘扬科学精神,组织开展了对王忠诚、袁隆平等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以及潘家铮、林俊德等院士先进事迹的宣传报道活动。2013年,我们将继续密切配合相关部门,宣传院士先进事迹,大力弘扬院士科学精神;动员和组织院士积极参与科学道德宣讲活动,做好为资深院士著述和出版文集工作;推进科学道德建设相关规定的落实,加强院士自律。

表情



郑兰荪院士(左)与孙家栋院士在讨论。

本报记者甘晓摄



“村官”李连成席地畅谈。

新华社记者顾立林摄



北京仁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秦升益展示他的创新产品。

本报记者甘晓摄

提案议案摘登

应给予中小企业更大支持

议案人:福建省工商联主席王光远代表

事由:福建是中国民营经济的乐土,是民营企业兴业的乐园。但就全国来看,民营企业的发展仍然困难重重。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问题,实质上是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问题。“国民共进”最重要的是构建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共生共荣、共利

共赢”的格局。经济危机到来时,靠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是不够的,必须靠政府和国有大银行通过海量的财政和信贷,方能保持持续增长。危机之后再出发,很重要的就是集合民间资本,切实解决中小企业门槛高、融资难、负担重的问题。其核心就

是推动“国民共进”。新非公经济36条(《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对中小企业而言还是“玻璃屋”,看得见,进不去。建议:像对待“三农”问题一样对待民营经济问题,切实推动“国民共进”。(本报记者陆琦整理)

发展小额贷款公司服务小微企业

提案人: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原总裁梅兴保委员

事由:目前,全国共有6080家小额贷款公司,贷款近6000亿元,弥补了小微企业大型金融支持不足的局面。小额贷款公司仍处于探索实验阶段,其发展面临税负偏高、融资难、政策、制度等方面人手,扶持这种新型小微金融组织的发展。

小额贷款公司按“金融保险业”科目征收5%的营业税,且其无法享受到对金融机构的相关

营业税免征优惠政策,还应以2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小额贷款公司的审批权和监管权主要归属于省级政府,而对金融活动的监管又是一项需具备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的工作,各省金融办在监管过程中往往感到力不从心。

建议:应将小额贷款公司纳入到支农、惠农的优惠政策扶持范围内,对其进行税收减免,并

给予适度补贴,鼓励其发展。随着小额贷款公司在我国农村地区的广泛推广,发展,急需相关的法律和规章加以指引、规范。放宽对控制权的限制,允许优秀小额贷款公司转型为村镇银行、社区银行。放宽小额贷款公司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融入资金的数额限制,以增强其放贷能力。(本报记者王静整理)

改革科技评价体系让国人分享科研成果

提案人: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杨维刚委员

事由:我国基础研究有一种怪现象:一方面,整体研究水平比较薄弱;另一方面,在高水平的基础研究领域,既需要进口国外仪器设备和试剂,又要将论文发表在外国期刊上,存在这种“两头在外”的现状。这样一来,中国科学家花了钱出了成果、发表了文章,却没有获得文章的版权,大部分科技工作者还是看不到、看不起。形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科技评价

体系出现了严重偏差,特别是目前普遍应用的评价工具已成为科技界的“皇帝新装”,成为绑架中国科技工作者的枷锁。

科学引文索引(SCI)是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编辑出版的引文索引类刊物。并非学术评价工具,是中国科技界最时髦的词语之一,是衡量大学、科研机构 and 科技工作者学术水平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尺度,导致科学研究误入歧途。对影响因子(IF)的强调也与之类似。

建议:尽快改革我国科技评价体系,以论文本身和知识产权的科学与技术价值评价论文。建议建立国家基础研究共享资源网站,凡国家资助的科学研究,我国科技工作者在国外发表的文章,均要求以中文在网上同步发表,让国人分享中国基础研究的成果,促进我国基础研究的发展。(本报记者甘晓整理)

我在现场

“脸盲症”的两会

■本报记者 甘晓

今年政协会议共有2000多名委员参加,在会议开始前,“认脸”成为我的第一道工序。我打印了可能遇到的和想要遇到的委员的照片,信心满满地上了会。

但是,到了会场,我还是傻眼了。放眼望去,除了少数民族委员外,大部分男性委员都身着深色西服、浅蓝色衬衫,佩戴眼镜,要一眼认出他们,实在太难了。就算头一次认出来了,他们转身又混入茫茫的委员中。

相比男委员,女委员就要好认得多,卷发的、短发的、不同颜色样式的着装。为了完成工作,我还是发挥了厚脸皮的优点,逮住一个委员并假装熟悉地问:“委员您好!今年带了什么提案啊?”委员们都接受了我的采访。最尴尬的是,采访后,我还要继续厚脸皮地弯下腰看一眼他的胸牌,记下他的名字。

到了科技界委员驻地,见到了熟悉的郑兰荪院士,他亲切地和我打招呼,让我如同见到了亲人一样。后来,我又认出了孙家栋院士、杨元喜院士、高鸿钧院士、潘建伟院士。我的脸盲症终于好了!

雾霾再袭引关注

■本报记者 陆琦

翻看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式的图片新闻,湛蓝天空下,代表们的笑容格外灿烂。

可是,不到24小时,人民大会堂四周随风飘扬的红旗已不再艳丽,远处的高楼影影绰绰,不少行人又戴上了口罩。两会刚刚开幕,新一轮的雾霾又将北京笼罩。数据显示,3月6日凌晨,北京局部地区的PM2.5达到了200甚至300以上。如此不容乐观的现状,一方面引发代表委员热议,另一方面也成为记者关注的焦点。

“世界上最可怕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牵着你的手,却看不见你的脸。”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引用网友的话打趣道。

近年来,生态环境问题一直是两会上的热点话题。在人大开幕式上,上千的记者围追堵截,期待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能在话筒前解答公众关心的环境问题,可惜,没能如愿。

3月6日,在代表驻地,环保专家成了记者们追逐的“明星”。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曲久辉就是其中之一。在记者采访他的短短半小时里,就先后被两个记者打断,他们的提问中都提到了PM2.5。

“下决心解决好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大气、水、土壤等突出环境污染问题,用实际行动让人们看到希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今年政府工作提出此项建议。我们真心希望,总理承诺的“希望”能够早日实现。

环保问题难倒代表

■本报记者 张巧玲

“我的问题是提给每位代表的:我们都希望改善环境,我们自己能做什么,比如单位能不能少用公车,多用电脑少用纸质办公,错开上班?”在3月6日的全国人大北京代表团开放日活动上,一位记者用激动的语气自问自答起来。

关于环保问题,代表们的回答仿佛并不能令记者解渴。“如果GDP增幅为零,环境却做得好,应该是政府官员最大的政绩;相反若污染太严重,让人们生活得很难受,要那么高的GDP增长干什么!”这位记者继续激动地说道。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和谊则讲了一段这样的经历:“前一阵北京等地区空气污染严重时,我正在国外谈判,看到国外媒体上天天都有北京的照片,用词那叫‘恐怖’。”徐和谊说:“解决北京的空气污染不是说北京人有多金贵,更重要的是它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形象。”

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态学研究研究所所长张大明说:“在生态学领域,公共资源悲剧也叫公共地悲剧,通常无法得到有效约束。”这样的资源需要不同的群体、不同地区的共同努力,通过环境意识的觉醒把这个问题解决。

北京市财政局局长杨晓超说,大气污染问题不是某一个局部的问题。杨晓超说,北京市为治理大气污染,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执行欧五排放标准,引进天然气替代燃煤等。2012年北京市共投入5000万元建设PM2.5监测设备。杨晓超透露,2012年北京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达到了100亿元,2013年的预算增幅不会低于9%。

提案缘何难落地

记者手记

■本报记者 丁佳

在今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听到不少委员反映,自己递交的提案虽然得到了答复,但真要落实起来,却还是比较困难。

全国政协是一个讲真话、讲实话的平台,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主要方式就是提案。每个委员都应当珍惜这样的机会,对自己所关注的领域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掌握扎实的数据,提案才可

能提到点子上,抓住问题的要害。与其盲目追求提案数量,不如提高提案的质量。

另一方面,我国国家在相当多的领域都存在多头管理、互相扯皮的现象,这给政协处理提案带来了很大阻碍。比如要简化行政接待,这看上去与很多单位都有关系,大家也都很赞同,但究竟由哪个单位牵头来办?恐怕谁也回答不上来。此外,对那些正在落实的提案,也应设置相应的反馈和检查机制。